

纵观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，经历磨难最集中、持续时间最长的，当属距今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当时，诸国争霸，战争频仍，上自士大夫，下至普通民众，都时刻面临忘国灭种的危险和山河破碎的煎熬。然而，就是在这磨难屡至的千古乱世中，却产生了一批英雄和思想先驱，他们用自己愈挫愈勇的品质和舍生忘我的精神追求，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心怀天下，忧国忧民

面对当时人心不古、世风日下的颓废乱世，很多有识之士都痛心疾首，奋臂疾呼，焚膏继晷，甘当木铎，以期警醒世人，拯救乱世。其中最典型的，当属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。

孔子生活的春秋中期，恰位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间节点上。当时的社会，王道不兴久矣，诸侯崇尚武力，藐视王权。为恢复周礼，振兴王道，警醒世人，孔子自年轻时即着力打破官学世守的传统，开坛授学，有教无类，潜心培养更多传道之士。待学有所得后，孔子积极入仕，力图通过政治手段革除弊政，移风易俗。他在担任中都宰、司徒、大司寇时，推崇仁政，宣扬礼制，堕三都，除君患，力图实现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王道之治。在因此而得罪当朝权贵、被迫离职后，孔子毅然远离故土，周游列国，食不求饱，居不求安，全力寻求复周礼、兴王道的理想乐土。晚年垂暮之际，在屡遭命运捉弄、弘志难抒的情况下，孔子又以文载道，全力整理“六经”，从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。

孔子之外，为挽救当时的乱世局面，其他有识之士也纷纷著书立说，献计献策，如墨家的兼爱非攻，道家的清静无为，法家的严刑峻法等等。各家开出的治世良方虽千差万别，且彼此多有纷争，但都殊途同归，百虑一致。诸理论先驱，不但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了对国家和世人的责任意识



苟利国家，不计生死

——先秦士人的救患意识和家国情怀

□ 骆 乾

不避艰险，勇往直前

时值春秋战国的乱世，战争和动乱成了生活的常态，仅春秋二百余年，就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”。在此环境中，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着国破家亡、宗族毁灭的危险，但很多仁人志士却都在大灾大乱降临时，先后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抗争，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、可敬可叹的英雄史诗。

公元前506年，在吴国军队的轮番进攻下，一度强盛的楚国几近灭亡，国都被攻陷，国君被迫流亡。在诸贵族大臣纷纷出逃避难的时候，申包胥却孤身前往秦国求援。在遭到秦国君臣婉拒之后，申包胥便立在秦都城墙外，痛苦悲哭七日七夜，水米不进，从而用自己的赤诚感动了秦人。最终，申包胥率领秦国支援的五百兵车回楚击吴，挽救了即将倾倒的楚国大厦。楚国安定后，申包胥对国君的重赏坚辞不受，而是携带一家老小退隐山林，远离世事。

公元前440年，当强大的楚国计

划进攻宋国时，身为宋人的墨子决意凭己之力化解此次危难。他一面责令众弟子协助宋军守城，一面徒步疾行七日七夜，到郢都劝阻楚人。他先说服巧匠鲁班停止制造攻城的云梯，然后面见楚王，用如簧巧舌力陈攻宋的危害，并利用自己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，向楚王展示将采取的各种守城策略，从而成功打消了楚王发动军事行动的念头，拯救了岌岌可危的宋国。

此外，还有在卫国内乱之际，冒死冲进都城制止暴乱而不畏牺牲的孔子弟子子路；明知不可能成功，但为了阻挡秦人灭燕而慷慨赴死的刺客荆轲；以及为了帮鲁国夺回被侵土地，而敢于在守卫森严的诸侯会盟上以匕首劫持齐恒公的鲁人曹沫等等。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智慧，展示了爱国赤子的无畏与担当。

尽己所能，为国解忧

除外敌入侵、国难当头外，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难、民众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，总有一些仁人志士，利用平生所学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

在孔门弟子中，子贡以其雄言善

辩的口才和极富应变的外交才能，深为后人景仰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公元前483年，齐人田常大举攻鲁，妄图侵鲁而自肥。在此国削民辱之际，子贡果断奔走各国，用己所长，为鲁解难。他先说服齐人移兵攻吴。然后远徙至吴，极力劝谏吴王出兵，救鲁攻齐。为打消吴王顾虑，又到越国劝说越王示弱，以坚吴王北上之志。随后，为避免吴军北上后欺凌中原诸国，子贡又西至晋，说服晋君积极备战，待时抗吴。子贡的这一系列外交活动，不仅成功化解了鲁国危难，而且有效改变了当时诸国之间的实力对比，所谓“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而霸越”，“十年之中，五国各有变”。

公元前524年，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火灾，境内一片慌乱。面对此异常灾情，执政子产临危不惧，积极发动各级官吏理性救灾。他首先妥善安置诸国宾客，确保不因此影响正常的邦交。然后派人抢救和转移贵重物产；明确各级官员职责，加强灾情防控和巡视；加强防卫力量，确保都城稳定；向友邦及时通报灾情，寻求外部支援；最后，在大灾过后，又

积极赈济灾民，做好灾后重建工作。在子产的有序安排下，郑国在此次灾祸中成功将损失降到最低。

公元前284年，东方的齐国在秦、魏诸国的攻击下，陷入亡国的危境之中。诸国联军陈兵齐之边境后，燕人乐毅又迅速占领了齐都临淄，继而横扫齐地七十余城池。除了莒县和即墨外，齐国全境悉归燕人所有。在此危亡之际，齐人田单果断带领民众坚守即墨城，妻妾、族人俱编入行伍，并散尽全部家产，资助军民作战。在战争相持阶段，田单先巧施反间计，促使燕人撤掉乐毅的兵权。然后利用火牛阵大破燕军，收复失地，重建齐国，“遂存齐社稷”，立下了不世功勋。

通过分析可知，上述诸人中，不乏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学士，但他们在危难之际，同样可以和武士一样，迎难而上，尽己所能，为国纾难。

推己及人，天下大同

春秋战国时期，列国林立，多邦并存，一旦他国发生重大灾难和紧急

危情时，很多有志之士也都积极发挥人道主义情怀，出人出物，协助友邦度过灾难。

公元前647年，晋国发生严重灾荒，举国乏食，告急于秦。秦穆公虽然对时任国君晋惠公心存不满，但为了晋国百姓，还是在名臣百里奚、公孙支的劝说下，积极输粮于晋，拯救晋民。史载秦国送粮于晋的车队，从秦都雍城一直延续到晋之绛城，首尾相连八百余里，车马相接，络绎不绝，输粮近万斛。最终，靠着秦国的慷慨解囊，晋国顺利度过此次灾难。

公元前662年起，国势衰弱的邢国、卫国先后受到北狄的入侵，国削民散，几尽亡国。为解决兄弟邦国之难，齐桓公在管仲的劝谏下，果断率军攻伐狄族，城邢封卫，并赠送卫君“乘马，祭服五称，牛、羊、豕、鸡、狗皆三百与门材”等，协助其复国，从而使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”。

公元前258年，秦军包围了赵国邯郸，妄图一举歼灭赵国。为帮助赵国消除危机，时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信陵君决意发兵救赵，以尽友邦情谊。在全力劝谏魏王无效的情况下，信陵君果断派人窃取魏王兵符，并使人击杀拒不发军的魏将晋鄙，从而成功统领八万大军，前往邯郸救赵，并与赵军里应外合，粉碎了秦人的亡赵计划。

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曾指出：“春秋时人道主义固以发达”。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战争连连、杀戮不断，但诸多仁人志士在战乱之余所体现出的以天下为公、急他人之所急的奉献精神，以及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人文关怀，无疑给冷酷的战争外表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的面纱，使人望之可亲。



郑板桥的为民情怀

□ 刘晓川



清代书画家，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所作郑板桥画像

六年，潍县北部被淹，郑板桥骑马前往察看，当他看到海水倒灌，白浪河、弥河等洪水泛滥等场景时写道“沧海茫茫水接天，草中时见一畦田。波涛过处皆盐卤，自古何曾说有年。”文如其人，言为心声，一个区区七品官，却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、投射在诗作的字里行间。正因如此，才使得“七载春风在潍县”的郑板桥在离开潍县时百姓夹道送行，“痛哭遮留”。

在潍县任上七年，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，生民涂炭，哀鸿遍野。面对灾害考验，郑板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官德。当时山东大涝，潍县尤烈，百姓疾苦。对此，郑板桥即令“大兴修筑，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”。当有人提出是否需要先向朝廷禀报时，他断然拒绝道：“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要是向上申报，往来反复，百姓怎能活下去？如果上面责怪下来，我承担便是！”面对百姓饥荒，他一方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，请求赈济，另一方面以工代赈，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；一方面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，供妇孺耄耋充饥，另一方面以身作则、节衣缩食，为饥民捐出官俸。正是因为郑板桥敢担当、敢作为，才赢得了百姓的广泛称颂。

人物志

为命运多舛、颠沛流离而又饱读诗书的成长之路，让郑板桥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处境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。乾隆十一年春，乍暖还寒，黄沙满天。郑板桥在书童陪伴下，从范县出发，一路向东。几天征途，郑板桥看到的是一队接一队乞讨、出逃的饥民，与他们相向而行的是滚滚逃荒的洪流。郑板桥看在眼里、痛在心里，长夜难眠、秉烛提笔，于是，便有了“十日卖一儿，五日卖一妇。来日剩一身，茫茫即长路……”的《逃荒行》。乾隆十

修“君子三德”方不忧不惑不惧

□ 顾伯冲



宙问题，下至个人问题，都了然于心。

勇者为何不惧，因为他们有浩然之气，当然这不是去逞匹夫之勇。他们的不惧来自于他们的刚正，行得正、做得端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刚强的意志在于内心的强大，而不是外表的强悍，面对命运的挑战依然能够刚强。他们有自己的意志，而不被人压制，在人生道路上不随波逐流，而是做自己人生的主人，通过自己的奋斗来获取自由。

能够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是有价的，真正的珍贵之物是金钱买不到的；有形往往有价，无形的往往无价。真正的强者总是莫测高深，不显山不露水，默默耕耘，苦心孤诣，直至成功；甚至成功以后，这样的人也不喜欢张张扬扬，而是继续探索寻求新的突破，这才是低调而持之以恆的强者。

君子的这种底气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程中，融会了众多民族的文化、思想和智慧，形成了

儒、道、法、墨等诸子百家思想体系，构筑了楚辞、汉赋、唐诗、宋词等形式多样的文化经典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追求、价值取向、高尚品质、文明准则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经过千百年的传承，汇集成博大精深、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，浸润于每个国人心中，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、血脉和灵魂。

低调是一种修养，是成就大事的一种方式。盲目地张扬自己的本事，亮出全部的看家本领，正如技穷的黔驴，让真正具有本事的老虎一口吃掉。只有底气足了，才能“乱云飞渡仍从容”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“谦谦君子”。通俗地讲，有了这种深入到骨子里的修养，才会有潇洒自如的从容。

君子并非天生就是君子，也不是读了几年书的人都有“三德”的底气。把自己锤炼成为君子般的人，往往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，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，除了具有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外，还必须要修

身养性的“静气”。

晚清政治家、两任帝师的翁同龢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养静气是修身养性的首要之举。就像练武、练内功一样，你要想炼出真东西，就必须让心静下来。一百天的筑基是最基本的要求，筑基阶段你必须闭关一百天。因为，只有在拒绝世界的时候，你的心才能沉淀下来。

当然，拒绝不是让人不接触世界，不跟世界发生关系，在一个人没能力拒绝世界的诱惑时，就给自己一个能静静地独处的空间，不要频繁地应酬世界，否则心必然会浮躁，静不下来，不可能成大器。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定力和智慧，不为一时的蝇头小利、声色犬马所诱惑，却往往是最后的赢家。所谓“大器晚成”“大智若愚”就是说的这一类人。“君子三德”精神之所以宝贵，是因为勇敢、尊严、优雅、荣誉心等品行的成长和发育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孔子那个时代为何是一个圣人云集、哲人坦陈、乐者放歌、群星灿烂的时代，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纯粹就为穷宇宙之理、解生命之惑，独自从坐于幽谷山洞，行于河边泽畔，心灵通透、精微而高远，有着无限量的广博和深邃；他们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仰观俯察，静思默语。终于，他们窥见了深不可测、高不可问的“天道”和“玄机”。他们思考的主题之宏大、思想原理之深厚、智慧类型之互补、智慧内涵之丰富、历史影响之深远，值得人们反复研习和继承发扬。

